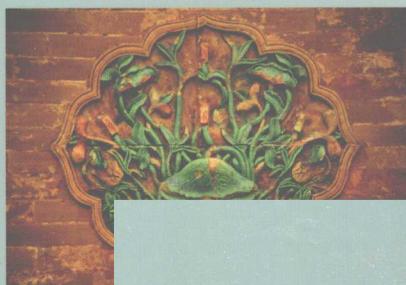


理想思潮与廿世纪清小说

赵兴勤 著



文物出版社

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

赵兴勤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孙 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 / 赵兴勤 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10—2992—1

I. ①理… II. ①赵… III. ①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①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2817 号

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

赵兴勤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龙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 1/16 印张:28.5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992—1 定价:80.00 元

目 录

绪 论

一、朱子之学的生成背景及其政治功利诉求	(2)
二、理学式微多重因素之检讨	(10)
三、王学勃兴与思想话语权的下移	(24)
四、明代讲学风气与小说创作趋向	(39)
五、理学与小说：矛盾着的交织与纠缠	(55)

第一章 世情小说的流变

第一节 世情小说发展的运动轨迹	(60)
第二节 明清世情与小说内容的多色调	(85)

第二章 理学与世情小说

第一节 伦理的演化与文本的表述	(107)
第二节 “以文自慰”：文学价值观的别样表述	(120)
第三节 儒学思想的蜕变与小说创作路向的转移	(137)

第三章 理学的嬗变与世情小说的构建

第一节 理学异端的崛起与世情小说家的创作心理	(152)
第二节 理学家的道德践履与世情小说的情节架构	(173)
第三节 理学营垒的分化与世情小说文化品格追求	(186)

第四章 《金瓶梅词话》的算峙与世情小说的分流

- 第一节 从《金瓶梅词话》到艳情小说 (202)
- 第二节 从《金瓶梅词话》到才子佳人小说 (218)
- 第三节 从《金瓶梅词话》到《红楼梦》 (231)

第五章 《金瓶梅词话》对理学的消融与解构

- 第一节 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与《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主旨 (254)
- 第二节 “家反宅乱”:《金瓶梅词话》对家庭范式的颠覆 (278)
- 第三节 《金瓶梅词话》与传统伦理的错轨 (306)
- 第四节 鞋杯:文人对雅俗生活的双向渗透 (321)

第六章 “事”、“理”相依:话语的转换与叙事策略的调整

- 第一节 从慕“美”到重“才” (333)
- 第二节 从守“经”到行“权” (345)
- 第三节 从唯“理”到尚“情” (356)

第七章 理学的反拨与世情小说的诗性叙事

- 第一节 诗意的消解与心灵的叩问 (367)
- 第二节 此“才”非彼“才”:耐人寻味的小说解读 (379)
- 第三节 诗性思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撰 (383)

第八章 清代学术与才学小说的兴起

- 第一节 清代学术走势及其形成原因 (398)
- 第二节 学问之风对小说内容的浸染 (404)
- 第三节 “时代思潮”、小说传统的接纳与自我意识的扩张 (417)
- 第四节 才学派小说的进退失据 (425)

主要参考文献 (429)

后记 (445)

绪 论

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的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在论及宋代志怪与传奇时，就结合当时的“崇儒，并容释道”^①，对小说作了内容探析，并指出“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②。所谓“宋好劝惩”，正是理学思想影响所及。有学者认为，理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伦理道德之哲学。为文，既受到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追求文以载道，就必然执著于特定历史时段的道德内涵的承载。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生活时代的道德文化，对其行为、心理的潜在制约是无法规避的。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酝酿，成熟和衰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要影响到世人的文化心理，不管是否真正介入理学之具体课题的思考，理学研习和论辩的文化氛围和有关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不能不潜移默化或明确诱导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心理”^③。理学与文学、文艺的关系问题，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相继有研究论著出现，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1989)、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1997)、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1999)、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2001)、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2005)、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2005)、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2006)等，但总体来说，理学思潮与小说尤其是与世情小说的关系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受鲁迅先生

①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8 页。

②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9 页。

③ 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 页。

著作的启发,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便涉及这一领域,在研究深入过程中,仍感到可以开拓的空间较大,故承往日之余绪,撰作本书以进一步探讨。

一、朱子之学的生存背景及其政治功利诉求

论及理学这一话题,实在是复杂而沉重。本绪论不得不简省笔力,将重心放在南宋的理学代表人物身上,重点说说“网罗古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的“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①朱熹。朱熹所生活的南宋前期,正值儒学思想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北宋诸儒,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在振兴儒学、排斥佛老方面,均作过积极努力。尝称: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②

竭力反对以佛老之学,斥其“乱我圣人之教”,强调“治世之本”,在于“仁义礼乐”。然而,这种努力,虽说对振兴儒学起到一定作用,但佛老思想对儒学的威胁依然存在,学人为《易》之“系辞”作解说,仍杂“佛老陈腐之谈”。而且,整个社会,公众信仰出现了危机,“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图、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移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③,故时人致有“天

① 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 年,第 200 页。

② 孙复:《孙明复小集·儒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范育:《正蒙序》,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九一《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①之叹。直至二程，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也是受了华严宗有关“净染”之说的影响^②。其后学，则是将佛学的某些推论方法，融会于《中庸》，用以发挥二程的基本思想^③。

面对新的思想格局，朱熹在不断探索继承儒学传统并发展、完善儒学思想之路径。据相关文献记载，孔安国能识鲁壁中所得古文《尚书》之“科斗”文字，创为古文尚书之学，著有《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为世所称，奉为大儒。郑玄博通群经、融会贯通，尤精“三礼”。人称，“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④二人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唐、宋之交，为学尚拘守其“家法”。至仁宗庆历(1041—1048)，始有所改变。南宋陆游曾描绘这一现象道：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⑤

以致疑经成为一种为学之时尚^⑥，“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⑦。恰如朱熹所说：“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

^① 范育：《正蒙序》，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九一《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第四章第五、六节，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④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第33页。

^⑤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5页。

^⑥ 参见赵兴勤：《赵翼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4—245页。

^⑦ 司马光：《论风俗札子》，转引自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2—1093页。

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①当然，学人疑经或疑传注，不为无据。古人好作伪，经书亦有伪作，以致是非淆乱。人或称“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②，“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③。儒生解经多引谶纬，语多怪诞，故欧阳修“欲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④。

朱熹受前人为学风气的影响，自然也疑经，“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⑤。然而，他的疑经，只是疑其中的部分内容，对儒家经典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主张用自己的眼睛去辨别真伪，“求个是底道理”^⑥，体味其为学之道的精神妙处。强调经史并重，称：“诸经诸史，大抵皆不可不读”^⑦，且读书“须是缓缓理会，须是逐一章去搜索”^⑧，而不能操之过急，草草去看。对于历代儒生为儒家经典所作传注，他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⑨。有传注在先，可令学者“省一半力”，读经者“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⑩，以明白为学之道。然解经不能“硬说”，随意阐释，也不能“好引证”以逞博洽，更不能“字字而求”，过于繁琐。他认为，“理皆在《经》文内”^⑪，须读原典，熟读玩味，考其义理。“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

①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3页。

② 王充：《论衡》卷二八《正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1页。

③ 王充：《论衡》卷二八《正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5页。

④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9—1090页。

⑤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9—1490页。

⑥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85页。

⑦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84页。

⑧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88页。

⑨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6页。

⑩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6页。

⑪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3页。

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得”^①。在他看来，“郑(玄)《笺》不识经大旨，故多随句解”^②，程氏之门人的解经，“非惟不尽得夫子之意，虽程子之意，亦多失之”^③。强调读书求义，不盲从他人，而应靠主体的发现与自觉，“到自得处，不从说来，虽人言亦不信。盖开导虽假人言，得处须是自得”^④。所以，朱熹为学，兼收并蓄，集诸家之长，既不拘守汉儒“专门名家，各守师说”之家法，亦不取当时儒生不复读经典文本，弃而不读“先儒之传注”，而“以意扭捏，妄作主张”的浅薄做法，而是从先贤时彦著述中广泛汲取营养，以成就自身的为学风格。这种治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强调读书应独立思考的刻苦精神，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对当今学者之治学，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所以，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曾这样论述道：

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及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差堪在伯仲之间。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⑤

然而，钱氏所论，多就其学术而言。其实，朱熹在经学发展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大都与其政治理想的实现有关。“述学”而重在“论道”。

朱子所生活的年代，内忧外患均甚深重。外有强敌在侧，虎视眈眈，时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0页。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3页。

③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6页。

④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397页。

⑤ 三联书店，2002年，第30页。

而南侵，索取不已；内则朝政昏乱，纲常不振，“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①苟延残喘，屈膝求和，“中外相应，更济其私，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朝廷之“德业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贿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唯朝廷“了无所得”，国家“独受其弊”。^②而且，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粜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挺变”^③。在朱熹看来，若要扭转这一颓局，必须从根本上着手，由帝王之道德修养抓起，即所谓“治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亲贤人，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④。“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今日諫諍之涂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圣先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⑤，“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⑥。帝王若能诚意正心，任贤使能，纪纲可振，风俗返淳，政事可修，夷狄可攘，“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在他看来，“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

①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5页。

②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2页。

③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3页。

④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0页。

⑤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8页。

⑥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7页。

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①。当时之朝廷之所以不能高瞻远虑，“随事以观理”，平治之效得不到显现，在于“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故强调“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经世之务，莫大于复仇”。^②以讲学求得革尽人欲，使纯然之天理得以凸显，朝纲、世风得以转机。

国家处在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朱熹出此拯世之“良方”，究竟是否合乎时宜，姑且不论，但他那有志于圣贤、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与真诚，还是值得赞许的。难怪人称：“至于理学之真，则自有其卓然不可没者。”^③朱子的许多议论，不少是针对时弊而发，有挽狂澜于既倒之想在先，故时有矫枉过正之语，所谓“性只是仁义礼智”^④、“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⑤、“学者须是革去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⑥、“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⑦、“若能一日十二辰点检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殒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⑧、“忠信，则无一事不诚实”^⑨。如此之类，似均为针对当时之积弊有感而发，所谓爱之愈深，痛之愈烈；求之愈苦，言之愈切，此仿佛有之。然所立之目标，却高不可及。有学者称：

凡讲学家，往往设想一尽美尽善之境以为鹄。说非不高，然去实际太远，遂至成为空话。中国人素崇尚古，宋儒又富于理想，乃举其所谓尽

-
- ①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7页。
 - ②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8页。
 - ③ 吕思勉：《理学纲要》，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 ④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岳麓书社，1997年，第58—59页。
 - ⑤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学二》，岳麓书社，1997年，第121页。
 - ⑥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岳麓书社，1997年，第200页。
 - ⑦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岳麓书社，1997年，第200页。
 - ⑧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岳麓书社，1997年，第215页。
 - ⑨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九《易五》，岳麓书社，1997年，第1537页。

美尽善之境，一一传之古人；而所谓古人者，遂成为理想中物；以此期诸实际，则其功渺不可期；以此责人，人亦无以自处矣。此亦设想太高，持论太严之弊也。^①

所论切中肯綮。

朱熹为学，出入六经，贯穿百代，立论正大，说理亦精，“传圣统以继绝学，正人心而息邪说”^②，“讹者订而阙者补，晦者莹而略者详”，“使真是真非若黑白之不乱，人心众理有脉络之可通”，^③且胸襟洒脱，言动肃然，“立纲陈纪，而不为苟简之计；摧奸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④，“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⑤，“以身任道，名教所存”^⑥。职此之故，深为当时学人所追捧，以至于“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夜三鼓聚于一室”，师徒“或更相问答，或转相问难，或吟哦经书”，^⑦至晓始散。此语虽出自韩侂胄之党施康年之口，但从另一层面证明了朱子讲学在当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朱熹之晚年，曾被许为进德修业“天下第一等人”^⑧，由宰相赵汝愚推荐，得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读，有了直接向宁宗赵扩陈述政见的机会。因直斥权臣窃取权柄、援引私人，得罪“方用事”的权贵韩侂胄。韩由此大恨，遂唆使其朋

① 吕思勉：《理学纲要》，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②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祭晦庵朱先生文》，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3页。

③ 陈淳：《北溪先生全集》卷四九《奠侍讲待制朱先生》，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4页。

④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祭晦庵朱先生文》，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2页。

⑤ 黄榦：《朱熹行状》，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7页。

⑥ 陈文蔚：《陈克斋集》卷四《祭朱先生》，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5页。

⑦ 《庆元党禁》，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7页。

⑧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〇《道学崇诬》，《历史纪事本末》第二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1498页。

党，径指朱熹等为“伪学”，甚至有人“乞斩熹以绝伪学”^①，一时受牵累者上至当朝宰执，下至文武官吏，竟达五十九人。在当时，“韩侂胄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诬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纮言：‘比年伪学猖獗，图谋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②。尽管如此，朱熹死后，“会葬者亦几千人”^③。理学在当时之遭际，由此可见。

尽管朱子于身后集万千荣宠于一身，但其思想却遭到扭曲和篡改。在官方教育读本中，程朱思想特别是朱子学中理性的一面，不断被人为淡忘或有意误读、遮蔽。“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具有特殊历史针对性的矫激之语，却得以反复渲染，进而被引为“经典”的全部。职是之故，落第举子看到的只是理学的枯燥与无情，市民看到的不过是理学的压抑与禁欲，有思想的个体看到的乃是理学的空洞、苍白以及了无情趣，戴着阶级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学人看到的却是虚伪与反人性。于是，理学对最高哲学范畴“理”的深思与穷索，理学家日以义理浸渍人心的德行修养功夫以及理学所特蕴的对主体人格精神的涵蕴、对儒学精神的承继发扬、对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或搁置了。即便后世一些普通的知识个体，在对朱子之学的体认过程中也充斥着无知的傲慢和褊狭的成见。正如明代思想家薛瑄所论，“后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〇《道学崇謗》，《历史纪事本末》第二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1499页。

② 《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朱熹》，《二十五史》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619—6620页。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六，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0页。

人之于朱子之书之意尚不能遍观而尽识，或辄逞己见，妄有疵议；或剽拾成说，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①。朱子之学，以希冀与政治联姻、改善当世之环境起步，到为政治“绑架”，沦为维护纲常伦理的工具和被孤立的道德逻辑，不幸从一个硬币的正面走向了反面。

二、理学式微多重因素之检讨

朱熹为人、为学既然那么为人所推重，为何后世又屡受学人质疑与挑战？其间的原因是复杂的。约略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特定的社会情势与理学发展的受阻

朱熹所生活的时代，是各种尖锐矛盾交织的年代。面对现实的种种困扰，作为思想家的朱子，由于知识视野的限制，在军事进攻或防御方面，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尽管他在奏疏中一再讲“修明军政”、“君父之讎”，然而，“军政”究竟如何“修明”？采取何等措施“制御夷狄”？怎样才能收复失地，复“君父之讎”？如此等等，他不可能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措施，所关注的，无非是道德建构层面的内容。在朱熹看来，大臣的蛊惑朝廷、援引私党、交通贿赂、排斥异己，将士的敛财盘剥、挥霍无度，富豪的囤积居奇，细民的铤而走险，朝廷的纪纲败坏、德业日隳，皆是“人欲”太盛的原因。“人欲”盛则私心重，私心重则法度乱，法度乱则纪纲坏。所以，若要国力强盛，必须从整齐道德、重振纲常抓起。而道德建构，首当其冲的便是帝王的表率作用，然后才是官吏的拣选与任用、百姓的恤养与教化。他的基本思路，仍未跳出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②、“修其身而天下平”^③的思维模式。面对日益颓败的国势，强调从道德建设入手以提高君臣上下的整体素质，凝聚人心，固然不错。然而，道德的养成是在长期的学校、家庭教育、社会风气熏染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决非朝夕之功所能奏效。朱熹生活的年代，恰是危机四伏、如处累卵的非常时期。即以负有“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① 薛瑄：《读书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4页。

③ 《孟子·尽心下》，《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8页。

盛名的宋孝宗赵睿而论，他虽说于即位之初，“锐志恢复”，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率兵北伐，打过些胜仗，然而，“符离之败”，使得孝宗疑虑顿生，首鼠两端。在强大的金兵威慑下，被迫屈辱地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隆兴和议”，且于公函中改臣为“侄”，署“大宋侄皇帝某”。和议换来了暂时的安定，然“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①。对方磨刀霍霍，伺机南下，而朱熹在朝，却大讲修文兴学，“变化风俗”，远水自然难解近渴，似乎有点不合时宜，韩侂胄之流倡“伪学”之禁，固然是出自维护其集团利益的政治目的，但是，时人指责理学迂阔无用，毕竟一定程度地道着朱子学在当时的尴尬处境。

后世推崇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都在战争平息、国家安定之时。理学家“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功业”。而且，他们“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诉求。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②。这对于抑制人们私欲的膨胀、加强个体的道德自律、稳定社会现实，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大都着眼于其潜在的社会功用。然而，理学家“把作为‘至善之表德’的天理，同人的自然欲望和需求对立起来，并无限夸大‘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窒欲、绝欲以至于无欲。从而把‘天理’植入人心，变成至高无上、自然流行发用的‘道德命令’”^③。这自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一般来说，作为个体的人，受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

① 《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265页。

②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

③ 董玉整主编：《中国理学大辞典》，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页。

追求与价值判断。“人的‘自我’是一种自主的东西，它不同于社会、文化、信仰、价值，简而言之，它不同于任何他人”^①。“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和精神实在，但它又是多重的。每一个人本身都寓有很多的不同可能性”^②。而对个人的欲念强行压制，“还要把它从自我意识中排除”，“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③。希冀用道德的律令，让世人的价值追求整齐划一，无异于水底捞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明中后叶以后，随着社会结构和家庭模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邃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理学家所倡导的道德教条以及心性修养之法，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骤变，二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与疏离。此时不少学人对理学提出挑战，正是时势使然。

（二）取士方法、途径的单一与理学思想的异化

教育制度，各代有所不同，是个非常复杂的论题。此处仅就教育内容与取士方法而略加论述。宋时学校，“分习五经”，虽说“慎简师儒，赡给廪饩”，为读书人“通经习传，考订义理”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然诸生中却少有“经名行修气节之士”。“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④。贾似道当国，每以恩惠笼络学生。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三学之横”条曰：

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后，始声其罪。^⑤

学校教育人才之质量，可想而知。朝廷一再强调，“国家以儒立国，士习美恶，治道所关”。然仍“士风日薄，文场多弊”^⑥。“穷经学古者，或病于词华；

① [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年，第188页。

② [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年，第189页。

③ [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年，第166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二《学校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0页。

⑤ 《续文献通考》卷四七《学校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3210页。

⑥ 《续文献通考》卷三四《选举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3144页。